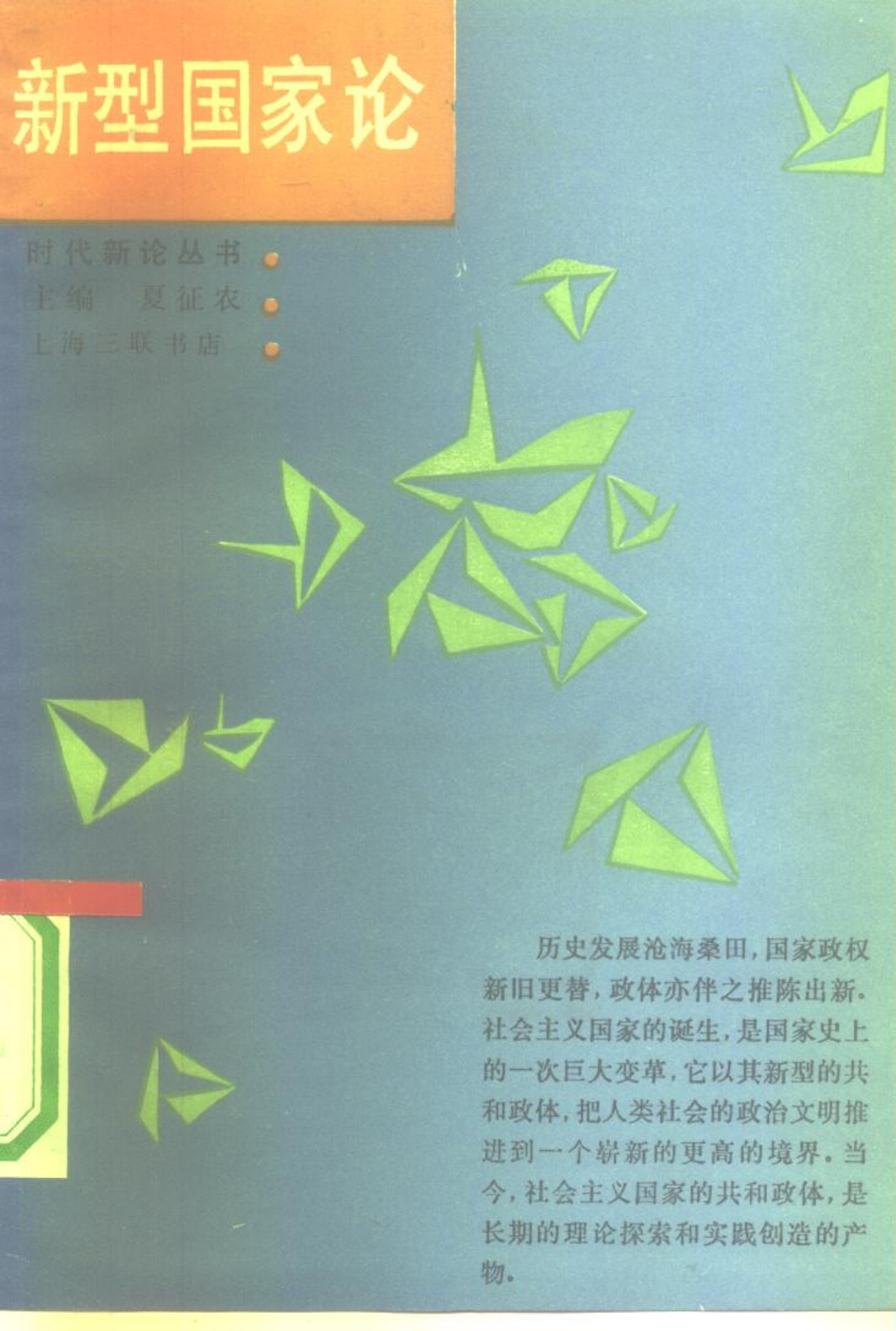


新型国家论

时代新论丛书 ●

主编 夏征农 ●

上海三联书店 ●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olid blue color. Scattered across the cover are several abstract, three-dimensional geometric shapes in a light green color. These shapes resemble folded paper or crystalline structures, with sharp edges and multiple facets. They are positioned at various angles, creating a sense of dynamic movement and modernity.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there is a small rectangular area with a red top border and a green bottom border, containing a white geometric shape that also resembles a folded paper structure.

历史发展沧海桑田，国家政权
新旧更替，政体亦伴之推陈出新。
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是国家史上
的一次巨大变革，它以其新型的共
和政体，把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推
进到一个崭新的更高的境界。当
今，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和政体，是
长期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的产
物。

新型国家论

柳振铎 主编

李惠康 倪传铮 桑玉成 撰写

上海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 赵立新
封面设计 范峤青

新型国家论

柳振铎 主编
李惠康 倪传铮 桑玉成 撰写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875 字数：122000
印数：1—2500

ISBN 7-5426-0423-6/D·11

定价：3.30元

面对严峻挑战怎么办

(代序)

《时代新论丛书》第一辑共四册，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陆续出版发行。这四册书是：

《新时期党的建设》

《新型国家论》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新探》

《帝国主义新论》

我为什么要组织编写这套丛书，以及我对编写这套丛书有什么基本要求？我作为丛书的主编，有必要向读者作一简单的说明。

(一)

一九八四年底，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忽然出现了一阵公开反对“清除精神污染”的逆流，把是否赞成“清除精神污染”作为能不能任作协理事的政治标准，并把上海几位被认为是赞成“清除精神污染”的同志从候选人的名单中剔去。作协代表大会竟成了否认四项基本原则，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会。“思想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是邓小平同志在一次理论工作会议上郑重提出的，“清除精神污染”是党的代表会议作出的决定；我不理解：怎么会被允许在党

中央直接领导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呢？从此以后，便不再提“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这说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仅严重污染了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不少同志，甚至影响了当时中央的个别领导同志。西方国家某些政治家推行的“和平演变”的战略已经在我国发生了作用，这是何等严重的问题！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合法，宣传马克思主义反而受到批评。西方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潮连同它的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毫无阻挠地向我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冲击。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几乎经常出现在某些报刊上；“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社会主义失败了”，“共产党不行了”，“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等等，成了部分青年学生中的日常话题。面对这样严峻的挑战，怎么办呢？当然，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很复杂的。同时，当世界上还存在着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思想体系的时候，特别是当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军事、科学还在世界范围内占领先地位的时候，出现这种现象也是难免的。正如中央一再提出的“反渗透，反颠覆，反和平演变”是长期的，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也是长期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斗争是长期的，对于当前的严重情况就无动于衷，听任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去污染和腐蚀我国广大人民的心灵。解决问题的关键，固然在于全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行之有效的政策，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也不能无所作为，应该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用自己的笔，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各种腐朽思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思想理论问题只能用思想理论去解决，资产阶级自由

化思潮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揭露它，批判它，战胜它。我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永远是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不会过时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反映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论要经过多少曲折，是一定会实现的；西方某些政治家的“和平演变”的妄想是一定要落空的。基于这种考虑，我便计划组织编辑这样一套丛书，从正面来阐述现实生活提出的而又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造成混乱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一次反击。我的这些设想虽然得到一些同志的赞成，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没有理论工作者愿意接受这套丛书的编写任务，因为这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直到一九八八年，党中央已经纠正了上面提到的错误倾向，经当时任上海新闻出版局局长袁是德同志（不幸他已逝世，这不能不是上海新闻出版界的损失）的推荐，上海三联书店愿意出版这套丛书。然后又经复旦大学张家骏同志介绍，王邦佐、朱文忠、严家栋、陈伟恕等同志分别接受了主编这四册书的任务，这套丛书现在才终于问世。这就是我组织编写《时代新论丛书》的原因及其经过。

（二）

《时代新论丛书》四册的书名都有一个“新”字。这并不是为了标“新”，随意加上去的，而是体现编写这四册书的基本指导思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于分析研究任何问题，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基本原理，同时也不能脱离实际而空谈理论。理论来源于实践而又服务于实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社会主义以及国家学说和党的建设等四个问题，都有专门的论著。这些经典著作所提出的基本原理，经过历史实践证明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它，就要犯错误。但是，由于形势的变化，其中个别的论点不适用于现在，必须用新的论点来代替，这就是历史留给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去完成的任务。因此，编写这套丛书，既不能离开经典著作中的基本原理而任意创立什么新观点，也不能脱离当前实际而满足于搬用经典著作中的有关词句，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著作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这就是我对编写这套丛书的基本要求。至于对这套丛书所涉及到的理论问题，我曾经把我的看法同几位负责编写的同志多次交换过意见。他们都是上海著名的学者、教授，都是学有专长的。我相信，他们对于有关理论问题一定能够作出令读者满意的答案。

(三)

最后，我还想向我们的青年理论工作者提一点希望。世界正处在历史性的转折关头，我国也正处在历史性的转折关头。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我党现行的基本路线和有关政策，虽然已见成效，取得了显著成绩，也还须经过实践的考验，不断取得新经验，不断使之完善。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动势力，必然还要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对我国进行渗透，以图实现其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岁月里，在世界范围内，还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突然事变；在我国，在改革的过程中，也还会不断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研究解决。我们的青年理论工作者，必须

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当世界上发生突然事变的时候，当我国在改革中出现新的情况甚至受到暂时挫折的时候，我们的青年理论工作者，不要像过去有些同志那些，把马克思主义抛在一边，一味想从资产阶级思想武库中寻找答案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不可能的，客观上反而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义务宣传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建设中国，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变化，不论我国出现什么新问题，我们的青年理论工作者都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去分析出现的新变化，新情况，分清是非，辨明方向，旗帜鲜明地同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这就要求我们青年理论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切实掌握和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进行斗争；同时，也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才不会被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和新出现的任何困难所迷惑，所吓倒。现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发出通知，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社会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将全党武装起来。这是我们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青年理论工作者更应该如此，没有武器是不能进行战斗的。

夏征农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日于病中

目 录

面对严峻挑战怎么办? (代序).....	1
结 论.....	1
第一章 长期争论的问题.....	1
(一) 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时期的争论.....	1
(二) 封建社会后期至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争论.....	6
(三) 资本主义社会至社会主义社会时期的争论.....	19
第二章 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和政体.....	32
(一) 共和政体的理论探索.....	32
(二) 共和政体的现实问题.....	42
(三) 共和政体的改革完善.....	51
第三章 主要是管理职能.....	65
(一) 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职能.....	65
(二) 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体制.....	74
(三) 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	89
第四章 党政分开.....	100
(一) 党政分开的基本原理.....	100
(二) 党政分开的目标模式.....	114
第五章 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125
(一) 民主政治的本来含义.....	125
(二) 民主政治的系统结构.....	129

(三) 民主政治的首要前提	139
(四) 民主政治的地位作用	149
(五) 民主政治的建设道路	155
(六) 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162
结 束 语	168
编 后 记	172

第一章 长期争论的问题

自从国家出现以后，人们在国家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古今中外众多观点的对立，盖缘于此。人类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之争，许多来自不同阶级之间，有些则来自同一阶级的内部。当然，除了阶级根源外，还有认识上的根源。

真理愈辩愈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就是在争论中得到发展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是这样。如果说，无产阶级专政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而诞生这一观点的确立离不开争论；那末，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巩固，从而最终为自身的消亡创造条件，这一观点的确定同样也离不开争论。

（一）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时期的争论

漫长的原始社会，人们生活在氏族之中，公共事务全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来维持。那时不存在强制性的特殊机构，人们不知国家为何物。当然，没有国家，国家问题的争论也就无从谈起。

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之后，国家代替了已被摧毁的氏族制度。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总是为自己的统治大造舆论，国家问题的争论随之而起。

在古代东方，国家问题的争论主要表现为尊天命与反天命的对立。

古代中国的殷王朝，说自己是上天的儿子，要人们如同服从上天一样服从自己。接着来的周王朝，说自己取代殷，也是上天的意旨，由上天所授命。春秋时代的孔子，继承了殷、周的天命思想，大讲上天主宰一切。《论语》所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就是说上天虽然没有说话，但四时的运转，万物的生长，都是按照上天的意旨行事。他告诫人们不要得罪上天，否则祷告也没有用。与尊天命对立的，是反天命思想的出现。不仅奴隶阶级不“畏”天命，敢“狎”奴隶主及其代言人的言论；而且一些唯物主义学派，纷纷提出了反天命的思想。子产认为天命不能干预人事，把天与人完全分开；墨子认为天命是暴君炮制出来的，提出人力反对天命，这些都是对天命思想的否定。

古代的埃及、巴比伦(今伊拉克)和印度也有尊天命之说。在埃及金字塔的铭文和许多文学作品中，国王(法老)是赖神(太阳神)的儿子，王权之尊，反映赖神地位之尊。在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中，国王权力来源于神，正是天神阿努、地神爱利尔、守护神马尔都克、太阳和光神沙马斯诸神明委托汉谟拉比统治奴隶。在印度《摩奴法典》中，国王是世界统治主的化身，他的光芒要比一切神所创造的事物都优越。这些把神意和王权结合起来的神话，引起了反对之声。巴比伦的“主人与奴隶的对话”一诗，描写了奴隶对奴隶主的嘲笑。奴隶主对祭神表示怀疑，奴隶就说：“不要祭吧，主人，不要祭吧，难道你以为能让神像狗一样为你效劳吗？”奴隶主要把奴隶杀死，奴隶就说：“我死后你也仅能活三天。”

在古代西方，国家问题上的争论主要表现为政权构成形式的分歧。

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拥护奴隶主民主政体，说在一个民主国家中过贫穷生活，也比在君主统治下过所谓幸福生活要好，就像自由比奴役要好一样；柏拉图拥护奴隶主贵族政体，即由最优秀的人——智者治理国家的政体，说军阀政体、富阀政体、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都偏离理想；亚里士多德拥护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中间性的共和政权，说它可以抑制富者，扶持贫者。他们都是奴隶制度的拥护者，其对于国家政体的研究，主要代表了奴隶主的需要和愿望，不过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些可贵的思想材料。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古希腊的伊壁鸠鲁认为，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便互相订立契约并制定法律，这是社会契约论的先声。

到了封建社会，国家问题上的争论有增无减，内容更为广泛。

中国从战国时代到明清之际，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国家观占据了统治地位。但不同观点仍然存在，争论并未停止。如：

“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战国时代的子思、孟轲，把孔子的“尊天命”思想发展为“天人合一”思想。子思认为，国家兴亡与天降祯祥或妖孽的征兆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孟轲认为，每隔五百年必然出现有德之王应天受命。而荀况发挥了子产的“天人相分”思想，认为自然界的运行有着自己的规律，并不因统治者是“尧”（传说中我国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有为首领）或“桀”（传说中我国夏王朝的末代暴君）而改变。他还进一步提出了截天思想，从反天命发展到制天命。韩非继承了

荀况的制天命思想，认为国家兴亡是由于力量强弱，与天命鬼神毫不相干。他要求强化国家机器，提出了法、术、势的主张。西汉时代的董仲舒，把思孟学派的“天人合一”和邹衍的“五德终始”（指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德性相生相克和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化的原理，以说明王朝更替的原因）结合起来，提出了君权神授论。他认为王是上天的儿子，上天把天下授予尧、舜。因此，尧、舜称王于天下。他还认为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这些受命都是尊天的表现。汉武帝为了强化国家机器，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时开始，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论，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学说。当然，这是就总的情况来讲的。晋代鲍敬言认为，君臣关系的产生，是由于强者压迫弱者，弱者服从强者；智者欺诈愚者，愚者听命智者。明代黄宗羲认为，有生之初，人们自私自利，各人管各人，公利公害无人过问，这时没有君主；后来，出现了勤劳、大公无私、为天下谋福利的人，这就是最初的君主。鲍敬言和黄宗羲的论述，尽管不科学；但他们不同意君权神授论，则是非常明确的。

民贵君轻、尊君爱民与君权至上或屈民而伸君：孟轲主张民贵君轻，认为在民、社稷和君三者之中；民贵君轻。荀况主张尊君爱民，认为君民关系如同舟水关系，民拥君如同水载舟，民反君如同水覆舟。因此，君要位安，必须爱民。韩非、李斯和董仲舒主张君权至上或屈民而伸君，韩非认为君主至贵至尊，李斯认为君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董仲舒认为屈民而伸君和屈君而伸天都是春秋大义。三种主张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在如何处理君民矛盾上是

有区别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稍有作为的君主，从历史经验中，大都认识到贵民的重要，无不把“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作为夺天下、保天下的口号。

在如何运用国家机器上，法家主张法、术、势，强调镇压职能；儒家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强调思想控制。

西欧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到 13 世纪封建社会的建立之后，由于政教合一，教会信条成为一切思想的出发点，基督教的国家观占据统治地位。但不同观点也有，争论也未停止。

神的意旨与人的理性：意大利的阿奎那推崇神的意旨，认为国家起源于神的意旨，正如《圣经》上所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国家的目的是指引被统治者通过有德性的生活以达到享受上帝的快乐。马西略推崇人的理性，认为国家起源于人的理性，理性的力量使人们产生了善恶是非的道德观念，制定了许多行为的普遍规则，以维持社会治安，从而建立起一种强制的组织。国家的目的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肉体和精神的幸福。

君主统治与主权在民：阿奎那推崇君主统治，认为政权属于一个人的国家往往繁荣昌盛，而政权属于许多人的地方常常发生纷扰和无秩序。马西略也是君主制的推崇者，但他拥护选举的君主制，反对世袭的君主制。他把国家分为立法和执行两个部分，认为赋予国家的立法权属于全体公民。他所说的全体公民，并不是广大人民群众，而是派有代表参加等级代议君主制选举机关的上层分子。

教权至上与王权至上：阿奎那推崇教权至上，认为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都是从神权得来，世俗权力要受宗教权力的支配，教皇有权开除皇帝或国王的教籍。马西略推崇王权至

上，认为《福音书》仅仅是诫谕，而不是法律；僧侣只能劝诫和说服，并无强制之权；教皇不能享有世俗权力，只能根据上帝的意旨取得世俗权力。他还提出了一切神职人员包括教皇均由教徒选举的制度。

阿奎那和马西略在国家问题上的分歧，反映了西欧中世纪神权政治与反神权政治之争。

14至15世纪，西欧进入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时期。这时资产阶级启蒙学家彻底地反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论，提出了系统的资产阶级的国家观。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国家观传到中国，产生了旧民主革命时期的国家观。

（二）封建社会后期至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争论

比起奴隶制、封建制时代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系统而又深刻，在国家学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大都批判了国家神造论和君权神授论，把国家从神秘主义的笼罩下解放出来。

17世纪英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和洛克，都不承认支配国家的超自然力量。霍布斯认为，人类曾经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是自私自利的，每个人都把别人看作自己的敌人。由于人对人像狼一样，因此产生普遍的战争，即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他认为，自然状态违背理性，理性要求摆脱自然状态。他把理性称之为自然规律，第一条自然规律要求人们力求和平；第二条自然规律要求人们放弃凭自己的爱好做任何事情的权利；第三条自然规律要求人们遵守缔结的社会契约。为了使社会契约得到遵守，必

须把它变为公共权力，交给一个人或一个集体。这种联合在一个人格里的人群叫做国家。就这样，自然权利转移了，自然状态终止了。洛克所说的自然状态，人是自由平等的，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除了自由平等外，私有财产也作为个人的自然权利而存在，这种描绘不同于霍布斯说的战争状态。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中，虽然人们拥有自由权、平等权和私有财产权，但这些自然权利并没有得到可靠的保障。因为人们有着利己的天性，满足别人利己的欲望，就有丧失自己财产的危险。为了保护自己和自己的财产，人们相互之间缔结社会契约，建立起国家。洛克和霍布斯不同，他的自然权利转移，只是在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和自己的财产的必要范围内，部分放弃，而不是全部放弃。

18世纪法国的启蒙学家孟德斯鸠和卢梭，也认为社会和国家的出现是在自然状态之后。不过，孟德斯鸠不同意霍布斯所谓自然状态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的观点。他认为和平是第一条自然法，战争只是在进入社会后才开始的。战争使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建立起来，国家就是在人类进入社会，建立人为法时才出现的。卢梭也不同意霍布斯把自然状态解释为战争状态。他和洛克一样，认为自然状态是平等和自由的，只有因年龄、健康等不同而产生的心理上的不平等。他和洛克不同，认为自然状态没有私有制。由于没有私有制，也就没有国家权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平等并不存在，人们具有原始道德的纯洁性。他的结论是，自然状态是人类的黄金时代。卢梭认为，完善化的能力为人类所特有，必然引向工具的发明，使人转为定居，从事农业。人们对金属的加工，则会改变土地的耕种方式，由此产生了私有制。他说，